

明史研究

Ming Studies Journal 第十五辑

中国明史学会 主编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黄山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史研究. 第十五辑 / 中国明史学会主编. —合肥: 黄山书社, 2016. 12

ISBN 978 - 7 - 5461 - 5994 - 2

I. ①明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中国历史 - 明代 - 文集
IV. ①K248.07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305835 号

出品人 王晓光
责任编辑 张元婷
装帧设计 熙宇文化
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(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)
黄山书社(<http://www.hsbook.cn>)
地址邮编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230071
印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
版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
印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开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字数 400 千
印张 19.25
书号 ISBN 978 - 7 - 5461 - 5994 - 2
定价 60.00 元

服务热线 0551 - 63533706

销售热线 0551 - 63533761

官方直营书店(<http://hsssbook.taobao.com>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
请与印制科联系。

联系电话 0551 - 63533725

晚明清初李开先《盘餐录》笔下的乱世经历

唐立宗

一 前言

2015年初,笔者为执行论文写作计划,曾利用学校放寒假的数十天宝贵时间,前往北京各大图书馆搜集明清史志文献。幸运的是,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借阅微缩胶卷时,偶然见到馆藏有《盘餐录》这样一份特殊的南明史料。这份史料文字不长,是采编年纪事体记录作者在明清易代之际下的个人遭遇,其中感叹沧桑之语,亦深有寓意,于是全文抄录,以作进一步的相关考证与诠释。

二 李开先的早年经历

《盘餐录》的作者是李开先(1608-1700)。李开先,字传一,四川重庆府长寿县龙市里人。曾祖父李秀春官监察御史,祖父李之应为官学生,父亲李士震,是1585年(明万历乙酉科)举人,曾任翁源、麻阳县知县。兄弟共五人,皆以科第出仕或耕读,可谓书香门第世家。李开先排行第四,幼年时相貌堂堂,“幼美丰姿”。14岁时,李开先随父任官前往湖广麻阳县,在当地考童子试,取得生员资格。回乡后,众所瞩目,以为今后将是“人中龙”。不过,成名过早或许也是一大压力,好事多磨,直到1639年(明崇祯十二年),李开先才和五弟李瑞鹤同时考取举人,此年他已是32岁了。^①

对于李开先而言,这段年轻时的读书求学历程,应该是最幸福的太平岁月。《盘餐录》回顾晚明的光景就提到:

昔自明太祖御极,海内无事,近三百年,士大夫际礼乐衣冠之盛,(受)享太平之(福)歌,高车驷马,邃宇深宫,可谓安福尊荣矣。且子弟袭父兄之势,衣租食税,肥马轻裘,在襁褓之中,即享甘毳之美,及其壮也,呼卢赌塞[赛],畅饮高歌,而其贤者亦不过较胜负于风云月露之篇,驰声华于笔花墨浦之内,承平日久,外

^① [清]何其徽:《己卯科孝廉李公本传》,收入[康熙]《长寿县志》卷八《艺文·传》,清康熙五十三年(1714)刻本。

患未经。^①

虽然始自崇祯初年,李自成(1606-1645)、张献忠(1606-1647)等人揭竿而起的战事连连,内忧外患不绝,但大多数人仍不觉得生活有异,以致“有语以寇盗者,则叱为不经,有谒以鞫牟者,则惊为怪物”。^②也恰好是1639年(明崇祯十二年),李开先的家乡“有大石忽陨于小市街,坏民居数十楹,死者数十人”,后来就有人视此为一连串动乱的前兆。^③回顾这段早年往事,李开先相当感叹:“所以手不能提指大之竿,目不能辨五兵之器,一旦变生不测,事出非常,鼠窜狼奔,茫无所适。趋走未数武,而喘息不停;饥饿未崇朝,而困惫已极。”^④

秋闱乡试后的次年春,即是开办进士科会试,有心应试的士子必须即时前往京师考场。1639年(明崇祯十二年)冬季,李开先、李瑞鹤兄弟两人与家乡举子同乘车船,在前往京师的路途上,已遭遇到些许风波。《盘餐录》纪录:

季冬上公车,舟泊江陵(沙市),从荆门(州)北上,土人以流寇扰中州襄樊,新郑道梗,因买舟由草(湖)市下武昌,过江黄,走池(州)、太(太平府),方抵金陵(南京)。时犹以入陪京友为游观之盛,而不知先集维霰,已见之道路不通间[问]矣。

从中可知这些士子原本要北上应试,但湖北、河南等地已出现“流寇”,道路受阻而无法前行,遂改道沿长江顺流而下,直抵南京。另一方面,这也显示明季文士对于国家内乱的安危存亡,多少还有抱着无动于衷的心态。

为了赶考,李开先在南京不能久留,随即北上前往京师。这段长途跋涉的路程,河南地区最为险象环生,《盘餐录》云:

于是由金陵渡江,向浦口(六合县),雇车骑。[十二月]廿二日,乃抵神京。过河南一带,地方避寇逃生者数千人,白日坐卧孔道,向往来贵人贾客乞钱。余兄弟方欲出钱以赈,而执鞭者急策其马,星驰而去,顷之谓余兄弟曰:“彼乞者之多,吾以两骑当之,拥挤至前,必有不测,幸其未近,且饥馁之徒,未能追逐,此两

① [清]李开先:《盘餐录》,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抄本。以下关于《盘餐录》之独立引文均不再一一标注,请读者谅解。引文中有()标示者,是为原抄本所添注的文字,而笔者补注之处,则以标示之。

② [清]李开先:《盘餐录》。

③ [康熙]《长寿县志》卷六《灾祥》。

④ [清]李开先:《盘餐录》。

公之福也。”思之果为股栗。

河南等地逃难者甚众,沿途尽是饥馑灾民,稍处置不当,后果难以预料,这段经历让李开先印象深刻。

1640年(明崇祯十三年)初,李开先来到了北京,心系科考,“不知边警”,并抽空拜访寓京乡宦陈新甲(?-1642)。陈新甲时任兵部尚书,对李开先关爱有加,“但军国重务,司马不便泄闻,而书生寡识,且汲汲于一第之荣,不复采访时务”。^①然而,这次进京赶考的结果却失利了,即“试南宫未捷”^②。发榜后,“流寇入关中”的消息传入京城,李开先得知“黄河一带,往来无患”,所以李氏兄弟与同赶科考好友古珍(衷湛)决定改由陆路返乡。《盘餐录》纪录:

过河南卫辉府,出城不数里,见死人枕藉于道,问之则饿死者也,方死则剖其肉而食之。再进则见名封大邑,灰烬无存,四顾寂寥,杳无人影。间或于颓垣败瓦中,偶见一二鸠形鹄面之状,亦莫测其为人、为鬼矣。自以为吾蜀福国也,下第言归,适我乐土,而岂知风雨飘摇之患,即在眉睫也哉。自是土贼猖狂,犹未敢公行也。

可见这段回程的惨状更甚于前,也让人为之惊悚,中原一带已尽成荒土,各地伤亡极为严重,不久四川地方也深陷乱事之中。

李开先在乡又居三年,积极地在为科考作准备。1643年(明崇祯十六年),他和“新贵古一鸣、何慎五、王青常、何我生复上公车”。^③根据地方志书记载,1642年(明崇祯十五年)长寿县的同科举人有古毓奇、何其徽、王长德、何自观共四人,与《盘餐录》的记载正好相符,一鸣、慎五、青常、我生,应当是这四人的字号。^④又据《盘餐录》所载,他们这次赶考的路程同样是如入险境:

至江陵,而河南又阻矣,仍迂道金陵,舟过湖广仙桃镇,见江干画舫百余,问之,则大镇左昆山讳良玉也,众皆不敢近。及抵金陵,寓城外普慧寺。一日,报李成龙兵近燕京,烽火达于涿州、蓟州,正踟蹰间,又报左兵数万雄据武昌,声言入援,实欲据有南都,以为观望地。一时仕途君子,食不下咽,各谋免窟,以安室家。

① [清]李开先:《盘餐录》。

② [清]何其徽:《己卯科孝廉李公本传》。

③ [清]李开先:《盘餐录》。

④ [民国]《长寿县志》卷八《选举上》,《中国方志丛书》据1944铅印本影印。

余入城侦之，见各门不过老弱数人，蓬头跣足，执杖呵察而已。居无何，相传会试改期秋八月，余等因整归鞭，而大江不可复问矣。

湖北、河南等地道路受阻，他们不得不绕路前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士子们关注到左良玉(1599-1645)的兵船有百余艘，又听闻武昌有兵数万，谣言四起，人心慌乱，各地出现失序的动荡场景。

科考改期对李开先的打击甚大，他在江南地区游历多日，主要是抒发心中苦闷郁气：

因下仪直[真]入镇江，过姑苏，走余杭，虽得观姑苏之盛，览西湖之美，拜岳武穆之祠，读滕王阁之序，而纡回吴越，怅望京华，游子心悲，英雄气短，即沽酒豪吟，临场作赋，亦已苦矣。

亦有传记提到他“因过姑苏，涉钱塘，访先哲之遗踪，身所经历辄记以诗”。^①如诗云：“春山日日子规啼，久客停云忆故蹊。别路伤心衡雁北，归鞭极目锦江西。他乡岁月移梅柳，故国烽烟动鼓鼙。闻说干戈连鸟道，王孙归去草凄凄。”^②透过赋诗或许尚能浇散郁积块垒的心愁。

接着，他从杭州开始往西返乡，沿路旅途还算平安，但对家乡安危的挂念与日俱增，《盘餐录》有记：

由是自钱塘达江西，自江西达湖广，自湖广之淑浦县走沅州晃水，历苗穴入黔之铜仁、石阡、思南、朝底，乃得取道彭水，而望家园。维时去淑浦三日，即闻吾邑有土贼彭长庚、七根毛劫县之变，士绅有罹其害者。抵家日，风景虽少殊，然犹安堵无恙。但家人惊喜，出于意外。盖先是有讹言吾属籍于兵者，故以此归为自天而下耳。是日也，坐舆中见上委罗公子，带兵千人，镇守吾邑，并捕缉土贼，久之撤去。而初冬又轰传“姚黄”逼近邻、垫，掳掠男妇，士大夫皆夜买舟楫避焉。邑令闻邑有知武事陈上锡者，可当一面，令督乡勇以拒贼。而陈素未临戎，不知彼已，方出，即为贼缚去，自是官民皆以舟为家矣。

李开先等人经由贵州转入四川，主要是为了躲避川东地区的军事锋芒。而长寿县本地除了有“土贼”劫掠，还惊传邻近地区邻水、垫江等地又有号称“姚黄”的起事者四处活动。所谓的“姚黄”，是指率众起事者其中两名首领的姓氏合称，时人回忆：“初犯蜀时，贼

① [清]何其徽：《己卯科孝廉李公本传》。

② [清]李开先：《癸未公车有阻迂道归里途中感赋》，收入[康熙]《长寿县志》卷十《艺文·诗》。

首摇天动、黄龙二贼，遂号摇黄。”^①或是有指称“贼首最著者曰摇天动、曰黄龙，蜀谓之摇黄贼。其掌盘子十三人，号摇黄十三家。”^②正因为蜀乱不绝，让这些四川士子极为牵挂，其后变乱日增，带给当地居民更大的冲击，“以舟为家”已是明末常态，亦成为李开先笔下的乱世景象。

三 《盘餐录》的史料价值

翻阅《盘餐录》，随处可见动乱纪录。李开先晚年撰述此书一开始即云：“从来治不忘乱，安不忘危，明哲君子，察往知来，积善于平日，决计于当几，庶免于患。”又云：“余身际时艰，备尝诸苦，幸蒙上天之佑，履险如夷，然余亦能知几自晦，卒以得免，故为是录，以告后人，老马识路，不可忽也。”其著述寓意在告诫子孙时时刻刻须居安思危。为何称作“盘餐”？李开先在书末则说：“余之纪乱，而名以‘盘餐’者何？古诗云：‘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’大半世乱起于饥荒，饥荒起于干旱，此古先王所以贱珠玉而贵五谷也。”^③亦即要子孙牢记先辈的辛劳痛楚，故有是书。

《盘餐录》的内容纪事，相当程度上可以弥补明清之际四川文献散佚的缺憾。正如康熙《长寿县志》的作者薛禄天所称“长邑，滨江为治，当全蜀东南之孔道，自甲申之后，受兵燹者较僻邑为更甚，人民流离几四十年，其文献之缺无怪也。”^④特别是“邑因乱播迁，前贤著作大半灰烬”。^⑤然而，《盘餐录》似乎未曾刊印。藏书家林夕表示：“稗史杂记等随笔纂录的文稿往往只有抄本传世，明季野史就是众所周知的大宗未刊文献。往年无意间在冷摊捡得抄本《盘餐录》一册，记明末蜀中人在战乱中的遭遇，诧为未见，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载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也是抄本。”^⑥可见目前存世的《盘餐录》至少有两个本子：一收于民间收藏家，另一则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内，两书均是抄本。

李开先善读性理诸书，手不释卷，著述甚多，“五经外如天文地理，奇门卜算，皆涉猎焉”。除了《盘餐录》外，他还著有《四书简明讲意》《礼记胜金讲章》《读易辨疑》《读史评》《卧游录》《玉海新编》《思齐录》《广韵考》《天台山房集》等作品。^⑦可惜的是，因“其生平

① [清]李馥荣，《滟濒囊》卷一《摇天动黄龙寇巴蜀》，收入何锐等校点：《张献忠剿四川实录》，成都，巴蜀书社，2002年，第32页。

② [清]费密：《荒书》，收入何锐等校点：《张献忠剿四川实录》，第423页。

③ [清]李开先：《盘餐录》。

④ [清]薛禄天：《序》，收入[康熙]《长寿县志》。

⑤ [康熙]《长寿县志》《凡例》。

⑥ 林夕：《抄本的鉴赏和收藏——古书版本知识》，《藏书家》，第15辑，2009年，第163页。

⑦ [清]何其徽：《己卯科孝廉李公本传》。

著作不自爱惜,散佚甚多”,以致这些作品大多未能留存。^①李开先也曾与当地乡绅王长德共同纂辑地方志稿,后来这部志稿在1714年(清康熙五十三年)被征集,作为康熙《长寿县志》的重修基础。这部重修志书对于“明末清初官军与农民起义军数度争夺重庆之战,以及兵燹之后民生凋敝之景象记之为详,且较具史料价值”。^②不过,若细之比较,可以发现康熙《长寿县志》对于明清易代时期的地方兵燹动乱,仍然不如《盘餐录》记载的详实。此后,1875年(清光绪元年)《长寿县志》、1928年(民国十七年)《长寿县志》相关纪事均沿袭旧志,未有更新。反倒是1944年(民国三十三年)排印的《长寿县志》,“其内容大量增加,各门类纪事又均较前志详细”。^③这本1944年排印志书还收入《盘餐录》的部分内文,难能可贵。

南明史专家谢国桢(1901-1982)编写《晚明史籍考》,长期专注于南明史料的各种撰述。他曾去信给四川文史学者询问是否看过《盘餐录》,因为他从未见过这部原抄本。^④尔后,他在《增订晚明史籍考》中另辟《补遗》篇,其中就增列了《盘餐录》一书题解。他指出:“著者李开先非作曲家李开先,乃蜀中一士人,于崇祯十二年己卯入都应试,以遇农民军兴起,遍地干戈,乃返其邻近家乡之彭水,避地而居焉。是书记张献忠率领大西农民军进入成都,姚黄十三家军起而与之响应。”^⑤王纲(1932-2013)最初也未能阅读到《盘餐录》,但他长期研究张献忠事迹,了解民国《长寿县志》转载这本书中张献忠起事的重要片段,认为对于“研究张献忠农民起义史很有参考价值。如该书对于明官军赵云[荣]贵部在张献忠入川时,抢掠川东地区的情况作了甚为具体的叙述”。^⑥

四 清初川东乱事与张献忠之死

川东地区对外的门户是夔州,明军在此地的十三隘口设有防务工事,以确保夔州以及川东最大的城市——重庆,不会直接面临到外患的威胁。据《盘餐录》纪录,1644年(明崇祯十七年)春季,号称“姚黄”的起事者已北上转进保宁府地区,顺庆府所辖的邻水、大竹等县危机解除,百姓“俱已复业”,原流离失所者“复渡南岸”,返回旧居。某日,驻守夔州十三隘口的明军急渡长江,退至垫江、长寿等地,“人皆带伤”。当地百姓问之,方知是“张献忠舍楚入蜀”,参将赵荣贵率领的军兵失守,奔溃流亡。士民闻知,又是仓卒过河避难。不

① [清]李以宁:《天台山房遗稿序》,收入[康熙]《长寿县志》卷九《艺文·序》。

②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:《四川历代旧志提要》,成都,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2年,第532-533页。此书承蒙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科研处张英聘处长协寻及赐赠,谨致谢忱。

③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:《四川历代旧志提要》,第535页。

④ 王纲:《张献忠研究与地方志资料》,《四川地方志通讯》,1983年第3期,第41页。

⑤ 谢国桢:《增订晚明史籍考》,上海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年,第1092页。

⑥ 王纲:《张献忠研究与地方志资料》,第41页。

久,赵荣贵本人也跟着撤退,并且还“纵兵搜掠”,以致“士大夫皆厚币以事之,乃免”。李开先听闻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王应熊(? - 1646)有一外甥唐之璟,是生员出身,“恃舅尊贵,保一石楼,众皆以为安,而借庇焉”,不料“赵兵索粮不遂,攻其楼,洗劫一空”,众人还是难逃噩运,居无定所。^①

在乱事中,最常出现谣言的散布,人们也容易感受到恐惧的氛围。例如当赵荣贵的军兵调往重庆,百姓又开始担心继任者是否会变本加厉,所以参将曾英奉命前往夔州镇守,“人心汹汹,恐蹈前辙”,所幸这支部队经过时,“纪律严明,秋毫无犯”。不过,部队离去后,还是谣言四起,“有云寇已抵万县者,有云寇已至酆都、曾兵皆降者”。^② 还有史料提到,该年六月,张献忠入川“斩关之报,日夜如炽,川东上下,鱼溃鸟惊,忠、涪、酆、万之间,烽烟如雾,草木皆兵”。^③ 川东地区首当其冲,于是李开先等人体认到“县不可居,议溯流而上,以避其锋”。逃难时,李开先注意到“江上舟近千艘,喊声如雷,昼夜兼行,灯火连接”。^④

李开先携家带着,大约十日方抵达重庆。一入重庆,并未发现守兵,偌大城市内“不过街民持数尺无刃之竿,望门讥伺而已”,此时汉中的瑞王朱常浩(1591 - 1644)虽也因为避乱而迁居至重庆,可是城内的防守却看似不堪一击,李开先见到“势不可为,遂决意挽舟入合州小江”,继续展开逃难的步伐,沿途还陆续传来不幸的消息。《盘餐录》提到:

去城方一日,遥闻炮声,昼夜不绝。到合州之下,遣人入城侦探,官民皆已逃去,只留空城。余等知不能前,因舍舟由陆投奔邻水之华阴山。途遇一老友云:“本州报到神京三月十七日已为李自成所破,先帝已升遐矣!”父子兄弟,相视恸哭。步至华阴后,有人自渝断手来者云:“重庆已破,瑞王死之,巡抚陈士奇死之,知府王行俭死之,巴县已行取知县王锡死之,垫江县知县欧阳询死之。”自是亲友之遇害、不遇害者,次第闻其悉矣。邑人有孔良者,舟至江津九龙滩,贼追及,不屈,大骂曰:“孔良,先圣七十代孙,义不辱。”延颈受刃而死。余父子兄弟乃自华阴回县之玉溪里,知贼已尽赴成都,因复旧居。十月,寇破成都,御史刘之渤死之。初,寇以死胁渤,渤不为动,既又饵以中丞一坐,渤亦不动,如此者三,渤乃怒骂,寇命缚之蜀府忠孝贤良坊上,以箭射之,民咸往哭,渤曰:“死分也,毋劳父老泪。”寇义之,命以冠服葬焉。

① [清]李开先:《盘餐录》。

② [清]李开先:《盘餐录》。

③ [清]阙名:《纪事略》,收入[清]赵士锦等著:《甲申纪事(外三种)》,北京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40页。

④ [清]李开先:《盘餐录》。

张献忠等人大约于六月二十日始攻克重庆,进入重庆之后,大举镇压。有研究指出他对于顽抗到底的明军官兵,都剝其耳鼻或断一手,作为惩戒。至七月初四日,张献忠自率大军向成都进发,八月七日开始攻城,九日攻下了四川的首府。^①两相比对,可知李开先的回忆时间并不太正确,但却也印证了重庆、成都城破的伤亡惨重,并间接证实崇祯帝自尽的消息约晚数月才传到蜀地。

《盘餐录》是李开先采编年方式纪录其见闻,关于1644年(明崇祯十七年)以后的编年纪事,《盘餐录》不书清朝的顺治年号,也不用南明政权的弘光年号,而是以崇祯十八年乙酉(1645)、十九年丙戌(1646)的纪年书写。其后更不书年号,仅以干支纪年,似具深意,特别是再过一年就是南明永历政权起始,不过也不排除是后人抄录所更改的结果。1645年(南明弘光元年、清顺治二年)春,明军收复重庆,招募兵丁,“得船千艇,兵千人”,南明阵营势力为之一振,不过对于刚逃回长寿县的李开先而言,最困扰的仍是长期占据地方的“姚黄”军兵,往往将“官舍民居,尽付一炬”。另一方面,地方民兵入伍者,“以披坚执锐为能,以采粮揭野为事,往来骚扰,民不宁居”。为此,李开先等人在住家前树立旌旗,“以混入于营兵之内,以免营兵之扰”,方得以安身立命。^②李开先有《即事》一诗云:“白帝城边几度秋,今春烽火不胜愁。龙钟自拟苏卿节,鹤发谁怜梦子头。满眼荆榛悲故国,百年簪笏付荒丘。徒夸孟德多生智,铜雀何人酌一瓯。”^③应该就是他在川东地区避难时所抒发的感怀。

1646年(南明隆武二年、清顺治三年)春季,大学士王应熊遥奉福建的隆武帝(1602-1646)旨意,于四川江津县之阳满嘴地方正式督师,并以道路有梗,朝廷无法选调命官为由,权宜礼聘李开先等人任官,但李开先不予理会。四川巡抚马乾(?-1647)同样行文征聘李开先任官,命令长寿县令刘起蛟亲自登门拜访,催促就职,李开先不得已赴县衙门请辞,当得知将被任命为保宁府推官时,他坚辞而归。其实当时川北的顺庆城已被张献忠的部队攻破,明军溃败,欲“调酉阳、石碛兵,皆以无饷不至”。^④可见即使李开先有意北上前往保宁等地任官,也必然受阻于途,甚至恐怕无法幸免于难。

关于张献忠的遇难地点、时间,各类史料众说纷纭,学界的看法分歧,不再赘述,在此仅就《盘餐录》的说法作一诠释。《盘餐录》言:

丁亥春,张献忠见蜀兵四集,复欲走陕,至西充为兵射死,众不能往,乃由顺庆下重庆,欲由遵义入滇、黔,曾瑛[英]迎战不利,既而营中火起,三兵惊溃,曾瑛

① 袁庭栋:《张献忠传论》,成都,四川人民出版社,1984年,第91-93页。

② [清]李开先:《盘餐录》。

③ [清]李开先:《即事》,收入[康熙]《长寿县志》卷十《艺文·诗》。

④ [清]李开先:《盘餐录》。

[英]登舟东下,舟重溺焉。副将李占春、余大海各率溃卒下走涪州,川东惊惶,郡邑逃窜。

这段纪录是夹杂逃难的听闻与事隔多年的回忆,真实性难免会打了折扣。例如张献忠大致是死于1646年(南明隆武二年、清顺治三年)冬季,亦即丙戌年,而非丁亥春。不过张献忠在西充地方中箭遇难后,其部众确实是急速南撤,面对清军穷追与南明军队的阻截,几乎快走到山穷水尽的境地,直到一举击破据守重庆的曾英部,曾英落水淹死,南明军队溃逃后,才渡江另打开南进的局。①

五 避难涪州与仕居彭水

根据李开先的观察,主帅曾英死后,副将余大海、李占春这些散将溃兵对地方的骚扰,不下于清军攻城略地所带来的地方伤亡,因此“余、李兵溃,官民尽欲逃去”。当时重庆府涪州的分守道官员是吴保泰,本为重庆府通判,在兵荒马乱用人之际,大学士王应熊“察其有能,以便宜升按察司佥事,分守涪州”。但面对逃到涪州的溃散兵卒,吴保泰无法节制,只好“出迎二将,与之定盟,犒以牛酒,助以米谷”,以安抚李占春、余大海等军兵。② 此举仅能维持短暂的平和,王应熊闻知后,特在1647年(南明永历元年、清顺治四年)正月时节,差人将李开先迎至涪州,《盘餐录》记录了王应熊的用意:

二将虽在城屯兵,然以主帅既没,有争为雄长之心,彼此相持,恐生他变。阁台去远,不及上闻,若得新按君各署以总兵御札,可无忧矣。但仆未谋面,请恐不允,无以安二将也。闻先生素见重于按君,望一言以为桑梓福。

王应熊是重庆府巴县人,和李开先有着同是重庆府的地缘关系,故欲透过私人乡谊来传达解决纷争之道。更何况同时间,“摇黄贼袁韬亦率众数万军于涪,名为降顺,而劫掠如故,涪人流离”,此时此刻实已到了内外交迫的局面。③ 果然,吴保泰见到李开先携来的公文信稿,格外喜悦,立刻向李开先下揖拜谢曰:“皆仆所欲言,而不能言、不敢言者。”随后李占春、余大海均升署总兵衔,“通营乃得安堵焉”。④

① 顾诚:《南明史》,北京,中国青年出版社,1997年,第343-344页。

② [清]李开先:《盘餐录》。

③ [清]夏道硕:《纪变略言》,收入[康熙]《涪州志》卷四《艺文》,第467页,《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》本。

④ [清]李开先:《盘餐录》。

李开先和家人来到重庆涪州的生活依旧是颠沛流离。首先他与家人避难于涪州的徐家场,不料立刻就被乡兵所洗劫。接着搬迁到武隆镇,又因故迁移至石碛司,寓居于当地的佛寺。当时逃难至石碛司地方者,络绎不绝,有的想避居于佛寺屋檐之下,但遭到寺僧的拒绝,李开先打听原因,方知“欲以待买猪者,取其微贖耳”,李开先不禁感叹道:“嗟乎!使逃难饥馑之民,蓬头跣足,无以安身,人贱于畜,良可悲矣。”^①更为可叹的是,乡兵与官兵的行径皆然,对百姓毫无怜悯之情,《盘餐录》则说明各方的盘据势力,对地方几乎是有百害而无一利:

是岁涪州则有李占春、余大海之兵;万县则有谭诎、谭宜、谭文之兵;遵义则有王祥之兵;川南则有杨展、袁韬之兵;长寿则有甘良臣之兵。甘之偏裨如彭长庚、余齐云、陈湛、郑可荣等,纷纷不一,皆日篋民以自肥者。督师则王阁部应熊、吕阁部大器;总督则李讳干德、杨讳乔然,然兵骄将傲,奉行故事而已。

至1648年(南明永历二年、清顺治五年)春季,李开先“自石碛走彭水,卧病旅舍”,某日忽然有官员来访,原来是奉阁臣吕大器(1586-1649)指示,要授予李开先出任彭水知县,李开先再三推让,不愿出仕,或许是考虑到李开先仍有顾虑,所以“复加以兵部职方司主事之札,以其便于弹压各营也”,但李开先“益固辞,卧病不起”,直到吕大器亲至彭水,“促令上任”,“不得已而受命焉”。^②据以上《盘餐录》的描述,可知李开先担任过南明政权的地方官职,也补充过当地志书对南明时期地方职官语焉不详的阙漏。

李开先出任彭水知县仅一年余,1649年(南明永历三年、清顺治六年)随着吕大器因病辞世,李开先借机辞官,归隐于彭水县的罗村。在闲暇时,“诗酒自娱”,著有《罗村岁时记》,“怡然自得,少入城市,邑宰屡邀之,辞不赴”。^③在困境生活中将“哀时触事,辄见之于诗”,是藉诗酒来浇愁。^④例如赋诗云:“四海无家一腐儒,行吟只合唱乌乌。酒钱岂乞苏司业,赋笔深惭宋大夫。口腹累人常自笑,头颅如许复何须。年末欲效无生法,静坐窗前木榻枯。”^⑤同时,他有意地断绝与外在的联系,亦是一种表现消极、悔罪的反思行为。^⑥在南明政权统治下的彭水县,长期未能平静,有史料记载:“是时彭地土寇四分五裂,割据争

① [清]李开先:《盘餐录》。

② [清]李开先:《盘餐录》。

③ [清]何其徽:《己卯科孝廉李公本传》。

④ [清]李以宁:《天台山房遗稿序》。

⑤ [清]李开先:《侨居彭水罗村感赋》,收入[康熙]《长寿县志》卷十《艺文·诗》。

⑥ 王泛森:《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态与消极行为》,收入氏著《晚明清初思想十论》,上海,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4年,第187-247页。

杀,且引土苗以作声援,焚戮之惨,甚于猷贼。”^①李开先也纪录1648-1649年间(南明永历二年至三年、清顺治五年至六年)彭水地方的物价与社会民生现象,他说:“大江斗米七两,觔肉一两,坛酒七钱,人民饥苦,以得草子米、河草花、芦稭算诸野菜者为幸;其余多杀人为食,或父杀其子,夫杀其妻,强杀其弱,不复知有恩爱伦理矣。”这时的地方物价,同样反映于志书的记载,只是比《盘餐录》更为简略。例如康熙《彭水县志》仅载当地己丑年(1649)因兵燹缘故,“牛羊犬豕无遗种,米斗八两,城野无居民”。^②而李开先担任知县后,“僻县稍安,斗米四两,觔肉三钱,家人犹得醉饱”。所以李开先在《盘餐录》中感慨又不禁欣慰地说:“斯则意外之逢,天之所赐也,然余亦有微善焉。”^③可见这次彭水仕宦政绩,他还是相当自豪的。

彭水地处偏僻,“环彭之境,皆崇山峻岭,无尺寸之坦途”。^④直到1660年(清顺治十七年),“彭始入版图”,方为清朝所统治。^⑤而李开先自1649年(南明永历三年、清顺治六年)辞官后,仍然寓居于彭水达八年之久。这段避难时间,生活不易,李开先还回忆当他要返回老家时,彭水当地“米谷虽稍平,而虎狼载道,白昼噬人,人虽十百为群,各持利器,必有一二不能免者,故自砮赴县应役者诀而去”。^⑥证实地方长期受到战乱影响,环境生态产生严重变化,不仅动物改变栖居地,地方百姓的生活方式与空间也遭到很大的冲击。

五 结 语

本文主旨探索《盘餐录》作者李开先的生平经历,阐述该书的史料内容与价值,希望藉此能重新挖掘明清之际被遗忘的地方历史。《盘餐录》所记载的晚明时期大江南北的纷乱、清初四川重庆、成都的惨重伤亡、川东地区军兵势力的纷争、彭水县境的民生社会现象,都可以增进吾人对明末清初这段史实的了解。

当然,还有许多史料尚待考证,以及应该与其他相关材料比对。例如同时期浩劫幸存者的纪录,尚有顺庆府广安州人欧阳直(1621-?)的《蜀乱》(又名《蜀警录》《欧阳遗书》)、成都府新繁县人费密(1625-1701)的《荒书》、潼川州遂宁县人张焘(1627-1715)的《燠

① [清]陶文彬:《王中军传》,收入[康熙]《彭水县志》卷四《文艺志》,第175页,《故宫珍本丛刊》本。

② [康熙]《彭水县志》卷三《灾祥寇氛志》,第149页。不过比其四川全省各地,彭水的粮食价格算是较低。特别是1647年(南明永历元年、清顺治四年)的大饥荒,“此时米皆出土司,雅州尚有大渡河所、越隽卫接济。米一斗银十余两,嘉定州三十两,成都、重庆四五十两”,显示米价随着粮食产地距离远近、供给难易,有很大的变化。参见[清]费密:《荒书》,收入何锐等校点:《张献忠剿四川实录》,第437页。

③ [清]李开先:《盘餐录》。

④ [康熙]《彭水县志》《凡例》。

⑤ [乾隆]《酉阳州志》卷四《彭水县志·官师》,成都,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,2010年,第133页。

⑥ [清]李开先:《盘餐录》。

余录》、成都府简州人傅迪吉(1627-1696)的《五马先生纪年》,以及雅州人李蕃的《雅安追记》(又名《明末清初雅安受害记》)。同样,南直隶太仓州人沈荀蔚(1638-1714)幼时随父至四川华阳县,在四川各地躲避战祸长达二十多年,返归故里后著有《蜀难叙略》,均可利用参考。结合其他下层民众逃难经历的研究,是今后新的研究趋势,更能让人理解这段特殊的历史。^①再者,张献忠的起事研究与史料,有必要再多加关注与征引研究。^②正如谢国桢提醒读者,《盘餐录》“所记张献忠之入据成都,建立大西政权,其用人行政,行军纪律,记之初不甚详”^③。

此外,现存的地方志书还有记载李氏家族在鼎革之际的避难活动,如其弟李瑞鹤,民国《长寿县志》有记:“因蜀乱避居贵筑,孙可望闻其名,欲官之,薤发逃去。迨逆氛既平,巡抚杨茂勋以礼延为子师,瑞鹤以方外服见,岁时赠遗,一无所受,后病没,杨公使人护丧归。”而李开先之子李征俦,则是在“甲申岁,避兵于石柱厅,时疫流行,亡者十八九”,以及次子李衡俦避乱时遭遇降清将领,不愿屈服而遇害等事迹。^④这些记载今后都可以一并考虑,加以充实本文的论证。

本文为“科技部”补助专题研究计划“征志方殷:清朝初期华北地方志书编纂与地方社会”(编号103-2410-H-260-006)执行成果之一。

[作者唐立宗,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]

① 诚如巫仁恕教授从社会史、文化史与士人心态的角度探析明清易代战乱时“逃难社会”的特色多半是从逃离城市至迁居乡村避难。参见巫仁恕:《逃离城市:明清之际江南城居士人的逃难经历》,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,第83期,2014年,第1-46页。

② 王纲:《大西军抗清史略》,北京,燕山出版社,1991年;何锐等校点:《张献忠剿四川实录》。

③ 谢国桢:《增订晚明史籍考》,第1092页。

④ [民国]《长寿县志》卷九《人物列传中》;卷九《人物列传下》。